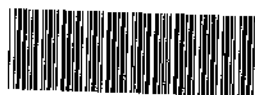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延安整风以后

邓力群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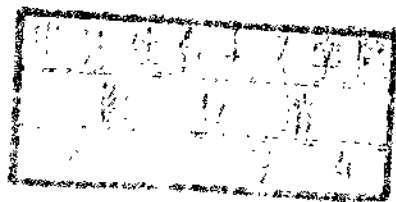
当代中国出版社



\*201016088\*

# 延安整风以后

邓力群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1998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延安整风以后/邓力群著. 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 1998. 4

ISBN 7-80092-696-6

I. 延… II. 邓… III. 邓力群-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2673 号

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60 毫米 16 开本 47.5 印张 2 插页 448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7.00 元

---

## 代序——回忆延安整风\*

延安整风，距今已经五十年。作为亲历者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，感慨万千。延安整风，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。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，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和胜利，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。它的历史功绩巨大，现实意义十分深远。

延安整风时，我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工作，是一个普通的干部，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。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，现在要讲权威，是胡乔木。他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，正遇上整风，帮助做了许多事。要我介绍，只能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一些情况，记忆上也难免有舛错。我对整风运动的理解，开始很粗浅，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。而且可以说，时间愈久远，我们愈理解它。只有深深理解了的东西，才能更确切地感觉它。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，使我终生受益。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，一直激励

---

\* 本文是邓力群1991年12月10日接受《党的文献》编辑采访时的谈话。

着我为党努力工作，而不知老之将至。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，改造世界（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）的许多本领，是在那个时候造就的。

延安整风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整风的酝酿和准备。一九四〇年九月，中央召开了会议，主要议题是回顾党的历史，分清路线是非，全面总结历史经验。遵义会议，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，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，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解决问题。许多党的干部，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的“左”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，王明的影响还有市场，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还存在，所以在某种适合条件下，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。

这时期，各个根据地的一些负责同志，我记得的例如彭真、彭德怀、杨尚昆等，陆续汇集到延安，向中央汇报工作。毛主席在听他们的汇报中间，联系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。党中央经过认真的讨论，对政治路线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，集中反映在一九四〇年毛泽东所写的《论政策》中。文章说明，毛泽东代表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，而王明代表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。

一九四一年五月，毛主席作了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。我当时作为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，参加了这个报告会，在杨家岭的一间平常开会的房子里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。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。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。回头一看，王明坐在我后面。我当时一方

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、不分前后，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；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，这个会议他怎么没坐在前面？宣布开会、主持会议的是彭真同志。他说是开一个讨论学习的会议，先请毛主席讲话。毛主席讲得很生动、风趣。他以明快而辛辣的语言，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、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，很能启发人的思想。会场上的情绪、气氛相当热烈、活跃。我回到马列学院，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。

对这么一个很好、很深刻的报告，不同层次的人，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据我所接触到的和间接听到的，特别是一般干部和年青的共产党员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。以我来说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，凡是中央的领导同志，无一例外都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。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，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，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包括在内。

这次报告后，中央一些部门进入了组织调整。我们马列学院在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，下设十几个研究室，把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中央党校。张闻天仍是院长。一个多月后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，院长还是张闻天，增加范文澜担任副院长。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三十多位同志（我是其中之一）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，组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。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党校等部门负责人先后都有变动。

一九四二年元旦，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，陈云同志讲话。他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，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，有成功，有失败。现在看来，最大的成绩，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，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，就是毛泽东同志。陈云同志这么说，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，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。这个情况说明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，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。

在一九四一年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，党中央公布了《增强党性的决定》、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，后来都收进了整风文件。

整风的另一项思想准备工作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汇编党的文献《六大以来》和《两条路线》，以及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》。当时负责编辑《两条路线》的是胡乔木。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加了一部分工作，主要是选语录、做校对、跑印厂等技术性工作。这几本书都由毛主席最后审定。

与此同时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，进行整风前的思想工作。我们政研室，毛主席找了陈伯达、张仲实、丁冬放、于炳然和我五位一起去谈。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，毛主席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，讲了两个来钟头。有些话相当尖锐，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，狗屎可以肥田，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。我当时听了觉得有些刺耳。

第二阶段是整风的发动。其标志是一九四二年二月毛

主席在中央党校所作的《整顿党的作风》的报告。接着毛主席又作了《反对党八股》的报告。好像巨石击水，引起强烈反响，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，反响更大。这两个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。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，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、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，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。

当时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，虽然有的听过报告或报告的传达，但对两个报告的深意，甚至对报告的字面意义都是不了解的。他们中不少人受自己经验的局限，误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。整什么领导呢？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。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，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。用什么来整领导呢？他们当时的言论和行动，所主张和表现的是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。当时有代表性的舆论阵地，原来就有一些年青人在文化沟办的《轻骑队》墙报，二月以后接着出来的是党校第三部的墙报。在他们看来，吃饭分大灶、中灶、小灶不平等，穿服装分干部服和普通服不平等，领导干部有马骑、一般干部没马骑不平等。七八个干部围一桌子才点两支蜡烛，为什么有的领导人一个人要点两支？后勤部长窑洞里，在一个窗门中间用了一小块玻璃，也成了被批评的事。当时可热闹啦，有画漫画的，有写小字报和打油诗的。我们研究室有位同志就写了一首“衣分三色”、“食分六等”等内容的四六句。王实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，写了《野百合花》，又在墙报上攻击李维汉同志，一时间把延安都轰动了。毛主席提着马灯去看了墙报，



什么没说，走了。王震同志从前方回来，发了脾气，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，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，攻击我们的党。

四月初，中央发出“四三”指示，规定了整风文件，要求大家精读文件，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对照检查每个人的思想和表现。组织上成立中央总学委，主任是毛主席。下面还有分学委。中直机关分学委的负责人有李富春、杨尚昆等。

经过“学风”的学习，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，开始认识只重书本、轻视实际的错误。我当时写了一篇短文《把箭向自己射》，登在政治研究室的墙报上，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。发表时，乔木同志把题目改成《我来照照镜子》。虽然检查是肤浅的，但确实表明我的思想认识已经有了转变。现将全文转录如下：

## 我来照照镜子

——学习散记中的几个片断

中宣部“四三”决定中指出：

“在阅读与讨论中，每人都要深思熟虑，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，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。”

这就是说，把“自己”当作一个客观的存在体，由自己亲自加以客观的全面的的研究。学习中常想想这个问题，也试验着这样去做。体验到这确实是一件不那么

容易的事情，比“专攻别人”实在要难得多。因为这是要：把二十二个文件做“矢”，把“自己”做“的”。并把这个“矢”去射“自己”这个“的”。这样一来，不是爱惜着自己的贵体，而不愿放箭；就是射出的时候，不愿真正的瞄准自己的痛处。能真正瞄准自己的痛痒，而且能一箭一箭地射出，直射到自己的“劣根性”体无完肤的时候而后止，这样有系统地严格地看看自己的“毛病”，对于我是少有的。对于别的同志呢？我在这里请问一声！

记得去年听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报告，讲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者是“言必称希腊，死不谈中国”时，因为自己是学习中国问题的，心里很高兴，颇有不少沾沾自喜的味道，以为主观主义与自己没有份。同时，头脑中，常常觉得自己是老早已在进行“实际研究”，反对主观主义的了，因而就觉得有些傲然。同样，在这次学习文件中，也老是觉得这里那里说的都是别人，与自己呢，是没有关系的。显然，这是自己的劣根性在作怪，经过它，“毛病”的营养品被吸收，而杀菌剂则被“中和”了。把自己一方面的优点扩大去掩盖自己另一方面的缺点，变成全面的优点；把党的文件中“有利于己”的拾起，“不利于己”的部分扔掉，甚至把前者做为挡住别人批评的盾牌，把后者专做为进攻与批评别人的“戈矛”，党决定中好的是指“我”，坏的是说“人”，这类现象，我们不是常见不鲜吗？

\* \* \* \*

想想过去自己学习中国问题，给别人教中国问题吧！

情形是这样：讲教训，必是一二三四五；分问题，定为历史背景，事变过程，革命性质、任务、动力、前途，失败原因，经验教训。用的方法，是“硬搬”的方法，不是具体分析的方法。六中全会有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点的分析，则必“运用”之去寻找反满统一战线，大革命反帝统一战线的特点；党提出抗战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又必搬到太平天国去找出“历史的根据”。用今天的观点，去看昨天的问题，用事变发展的完全的形态，去衡量不完整甚至没有发生的历史事变。对历史的真实情况不了解，甚至完全茫然，但讲起经验教训，却能一大套。所根据的材料，翻来覆去就是那仅有的几篇文件和几本教课书，不下苦功收集与占有具体的历史材料，不注意与无兴趣于历史的实际生活。不引导自己与别人去熟悉同盟会的真正活动，却斤斤计较着去钻研“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”，鸦片战争讲它二三次，目前中日战争一字不提。这样，历史成了不是历史，面貌已非，骨肉全无，从历史中看不出历史的发展，割断了历史，歪曲了历史，从历史中看不出历史的真况。

这是一幅滑稽的图画，这是对于研究历史的讽刺。在这里，“实事求是之意”是没有的，而“哗众取宠之

心”是有的！

\* \* \* \*

过去，听到看到讲到：“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由转向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观点上的知识界‘从外界灌输进来的’。在工人运动底第一阶段上，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做了‘革命细菌’和酵母。”（列宁选集（三）第413页）

非常的舒服，很合自己的口味。自己是知识界中的一份子，而且已经“转向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观点”，因之，傲傲然很有自得的意思。有着做个真理传播者的大抱负，想着在延安窑洞内好好地学习理论，以便将来到实际中，“从外界灌输进”工农群众中去。

近来看到毛主席的报告，才知道，没有与实际接触的知识界，是不能有灌输者的资格，而没有与实际相联系的理论，灌输进工农中去对运动是有害无益的。因此，知识界，要取得灌输者的资格，不仅须要“转向”，尤其须要“转向”后时刻与实际接触，并且还要这种“灌输”进去的理论是与实际密切相联系的理论。

据此，来检查一下过去所做过的某些“灌输工作”，就发现其中大都可以说是“坏种”，当然其中或许也有某些好的成分，然而这点东西也被那些“坏种”生长出来的“坏苗”盖住了。为了不让他生长，在今天，就必须连根铲除“坏种”所生的“坏苗”。

拒绝“半吊子”的口号，已经喊出了，我们这些

“半吊子”还是好好的反省一下子自己吧！

\* \* \* \*

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，是重要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按党史结束语讲：它是关乎党是否“陷于黑夜徘徊的地位”的问题，关乎是否“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”的问题，关乎是否“马克思主义就会开始衰颓起来”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容易被我们懂得的，然而使我们难于了解与做到的，却正在于怎样才能具有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。

时刻接触实际，时刻关心着实际的变化，对于接触着与变化着的实际之各方面及其内在的联系，又有着深刻的了解与研究，这样的实际家，只有这样的实际家，才可能才会有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。对于他们，新的事物有着最大的敏感，拘守昨天的理论则被认为最大的愚蠢与无知，甚至是罪恶。因此，只有他们，才能勇敢地坚决地以适合活的生活的新结论去代替旧结论。

可是，对于既无兴趣于实际，又无兴趣于理论的应用的书呆子，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，除了产生向马列主义捣乱的某些现象以外，是别无任何更多的结果的。——但是，更恰当的说法，应是：宗教徒的虔诚与蒙昧而已矣！“捣乱”二字加在头上，实在是高看了他们。

然而，在过去“所学与所用的脱节”的学习与教育

中，我们却曾对自己对别人，喊出了一大堆的口号：例如“敢于怀疑，敢于提出问题”，又如“不怕以新的结论去代替马列主义中某些旧的结论”。结果呢？或以咬文嚼字为有味，或以“怪论”“空洞”为珍奇。这就说明：要有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，第一就必须接触实际，第二就必须了解实际，第三就必须研究实际。离开实际的调查研究，空谈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，必成为“夸夸其谈”，或则演成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！

埋下头，向实际多做些调查研究，少昂起头高喊什么“充分的理论上的勇气”……等等，这便是党对像我这样连实际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的人的希望。

\* \* \* \*

和平发展时期与战争时期，革命高潮与革命低潮，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，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，革命成功与革命失败，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，敌人在我们手中与我们在敌人手中，国共合作时期与国共分裂时期，这一切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免要经过的形势、环境、情况，这一切是所有革命者所必须掌握的斗争的方式方法。

只有在这一切形势、环境、情况中，掌握着正确方向，不脱离革命立场的党，才能算作真正坚强的革命党。只有在这一切磨难与锻炼中始终站得住、立得稳的人，才称得起是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党的党员。

中国党到今天已经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布尔塞维克党，在党内也有着不少这样经过考验与锻炼的老战

士——坚强的战士。

我自己是很少经过锻炼的，可以说千万分之一的锻炼也没有。

这点，常常使我担心，以至害怕。我担心自己在这一切来到面前时，是不是能立得住、站得稳？这担心使我警惕，又使我准备。我是准备站下去的，而且我想我也会站得下去！

在这点上，我们多多向那些老战士学习吧！少看不起他们，实在讲来，在他们面前，我们确是渺小啊！

经过“党风”的学习，青年同志各自回顾了思想变化，检查了各自的历史，反省了自己的缺点错误，端正了个人和党的关系，确实增强了党性。有的同志说准确了自己的家庭出身，有的同志交待了过去隐瞒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。不少同志交待了当时颇为流行的“小广播”行为，从中发现党校三部有同志，政治研究室也有同志，经常和王实味在一起散播这类消息，并对中央的政治生活发表错误的评论。两个单位决定召开联合批判会。大会一起开，小会分别开，连续开了七十二天。批判会的缺点、错误，一是没有把那几位同志和王实味区别开来，二是批判的进程是不断上纲。

各个单位的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。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搞了十来天的“抢救运动”。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，搞了逼、供、信；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，双方的关系很紧张。正是这个时候，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

《九条方针》。它解放了被审查者，也唤醒了审查者，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自经验中，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。从此以后审干工作转入甄别工作，一直延续到七大前后才结束，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，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。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审查者向被审查者“脱帽鞠躬，赔礼道歉”，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。

一九四三年九十月间，“抢救运动”停止后，整风开始进入《两条路线》的学习阶段。这是整风的第三阶段。应当说，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《两条路线》的学习。参加《两条路线》学习的，主要是中央各单位的领导干部，几个人编成一组。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和财贸部的李六如等同志合为一组，先是集中学习《两条路线》那本书。

什么事情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《两条路线》既编进了正确的文件，也编入了错误的文件。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，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。这个文件产生了什么结果，那个文件又是怎样结果，经过比较，是非分明，功过了然。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，一条错误的路线。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，错误路线则以王明等人代表。

《两条路线》的学习经过一段时间，进入新的高潮。小组讨论，大会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。这时又出现了一种倾向，一些受过“左”倾路线打击的同志，对那些犯了“左”倾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过火批评，上纲到他们有政治问题。有的人毫无思想准备，就在大会上被轰出来、揪上台，要他说



清楚问题。会议开得非常紧张，毛主席当时没有说话。会后他讲，会不能再开了，开下去非“炸”了不可。后来，一九四四年四月间，毛主席作了《学习和时局》的重要讲话。向大家说明，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，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分析，弄清犯错误的社会根源、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，以便彻底了解党的历史经验，避免重犯错误；要实行弄清是非，团结同志的方针。这个讲话，对党的团结和巩固，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。在这个讲话精神的基础上，开始起草我们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。

现在来看这些事情，都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。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，只要善于总结，错误能够成为宝贵的财富。没有“抢救运动”，恐怕就没有《九条方针》；没有学习《两条路线》的一时走偏方向，就很难有毛主席的《学习和时局》中提出的那几条。矛盾成熟了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出来了。没到那个尖锐的程度，矛盾就难解决。毛主席显出了他掌舵的本领，对于问题就是能抓住时机、抓住火候，抓着以后就以最妥善的办法来解决。比如讲六届四中全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，按照当时一些同志的讲法，都把王明这些人说成是篡党，四中全会就是非法的。这样一搞，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，必然牵扯到一批人的问题，那党就不得安宁了。毛主席说四中全会是合法的，但手续不完全。这样，一批人就解脱了，党内其他同志也心服了，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。事情往往是这样，批评了错误，对错误给以充分揭露以后，最后给予恰当的定评，是巩固正确认识的很重要的